

中西方文化碰撞下的兼容与离间

——从严歌苓作品中的底层形象审视其文学创作

段楠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严歌苓作品中的底层形象可以根据其作品主题大致分为两类,移民生活中的底层人物和国内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浪潮的见证者。他们都是生活贫苦的人,作者通过对他们生活境况的描写以及人性心理的描摹,展现出这些边缘人物生活的窘迫,人性的本真或扭曲,体现出作者深受中国传统和海外移民的双重影响,力图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冲突中对最具矛盾深刻性的身份及情感认同问题予以真实展现与深入剖析。

关键词:严歌苓;底层形象;心理刻画;矛盾与冲突;文化差异;自我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2)01-0099-05

旅美女作家严歌苓的创作在海外新移民作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女性作家,她以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将自己对生活、对生命的思考,融入到极富文化意蕴的小说创作中,创作出一篇又一篇极具魅力的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就像人的眼睛一样,眼睛是人类心灵的窗户,而人物形象则是作品意蕴的窗户。严歌苓笔下的人物形象,尽管形象各异,但异中求同,总的来说是一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通过这些形象,我们能看到作者以一个女性作家的细致,刻画出了一个极具深刻内涵的形象,其中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反思,也有对海外文化的包容与批判。

一、边缘地带的底层形象

从主题上划分,严歌苓偏爱两类主题的作品,一是有关移民生活的描写,二是对国内历史、文化浪潮的回忆。按照表达主题的不同,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不同的,但可以说无论是哪类主题下所塑造的形象,大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无权无势、无财无力的人。

1. 生活艰难的移民者

达·芬奇曾说:“画家的心应该就像一面镜子,永远把它所映的事物的色彩摄进来,前面摆着多少事物,就摄取多少形象。”^[1]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它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有关移民群体的描写,我们不能不说极大地受到作家自身的影响。作家自身就是移民群体中的一员,显然对移民生活受到过困苦,尝尽了心酸,更是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

留学生无疑是主要的移民群体,他们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学习、生活,这个环境带给他们的是无法躲避的语言隔阂、文化差异以及生存压力等很多问题。严歌苓作品《栗色头发》、《学校中的故事》、《也是亚当,也是夏娃》、《无出路的咖啡馆》等作品中的“我”,都是这一代留学生的代表。他们都带着中国的印记,在一个远离自己家乡的地方,拼命地生活,努力地打拼,去承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磨练。例如《栗色头发》中的“我”初到美国时,“一本正经地穿着皮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丝绸衬衫的纽扣从脖子一路扣到底,毫不马虎。我后来明白穿着上如此的严谨、繁琐,就被称作‘土气’。后来我也根据这点判断谁是大陆的最新来客”^[2]。因为语言的障碍,“我”被抛进了一种陌生、孤立的环境,“我和所有大陆来的学生无二致:想多挣钱、少付学费、住便宜房子和吃像样的饭”^[3]。《无出

收稿日期:2011-07-08

作者简介:段楠(1987-),女,河北清苑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路咖啡馆》中“我”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身处于穷人的行列,甚至有这样的论断:美国最穷的人是留学生,而不是乞丐。然而他们并没有放纵自己,即使过着窘迫的生活,还是有着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奋斗。《学校中的故事》中的“我”将一切困难和贫穷视为动力,以激励自己努力奋斗。《栗色头发》中的“我”刚到美国时候,是怀着理想的:“我的理想是在美国学习,同时当个小说家。”^[24]这些留学生的生活和心态成为了中国移民者的代表,他们身上不只是有生存的艰辛,更有那种拼命融入到另一种文化的坎坷。

通过婚姻出国的女性在新移民中也不是少数,在她们的婚姻观中,爱情不是考虑的要素,甚至年龄也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她们往往将婚姻作为一种手段,与外国人结婚,从而利用婚姻取得外国国籍,并给自己的亲人带来出国的机会和比较好的物质条件。例如《花儿与少年》中的徐晚江为了过上好日子,不惜和自己的丈夫离婚,然后和一个70多岁的美国律师瀚夫瑞结婚,移居到美国,然后把自己的儿女都接到美国生活。《红罗裙》中海运为了儿子健将,嫁给一个72岁的美国籍老男人,按照她的想法,出了国,健将的没出息、不务正业就会不那么显眼,和亲戚们的孩子相比,就不会显得没出息了,只要他一出国,将来回来,那就是另一番高低。

2. 历史、文化浪潮的见证者

严歌苓自己说:“刚到美国,对西方事物处处感到新鲜,觉得都是写作的好题材,可是在美国住了十五年,再回头看大陆,却觉得大陆生活很新鲜。”^[25]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她的作品前期大多关注移民,后期笔锋一转大量创作描写文革、土改等题材的小说。

在《白蛇》中,作者通过对一个女舞蹈艺术家的描写,展现她在文革时期经历的种种磨难。小说通过对这个事件的多种版本进行描述,官方的、民间的、还有诸多不为人知的,表现出一个身处下层的小人物在文革中受到的许多虐待,可能还不止这些,可能还有更多的不为人知,但是我们通过各种版本的对比,隐隐约约地可以猜到现实是怎样的,从而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给上级单位的报告是多么的冠冕堂皇。《天浴》中的知青文秀,为了回到成都,利用了作为女人可以利用的一切,出卖自己的尊严,忍受着别人的冷眼,为的只是离开这个让她放牧的地方,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但最后得到的却是死亡,也许这样才是一种不错的解脱。《第九个寡妇》中孙怀清在土改中被批斗,定了富农的成分,应该是要被打死的,却被自己的儿媳妇王葡萄从鬼门关救了回来,在地窖中度过了20年不见天日的日子。在《惠子物语》中以一个名叫惠子的年轻女孩的视野描绘出一个个在历史的浪潮中饱受折磨的生命个体。

作者描写的文革中的故事大多都是根据事实写的,不会淡化事实,也不会添油加醋地更改事实。例如《第九个寡妇》中作者没有花费很多笔墨来描写孙怀清如何受到批斗和迫害,反而着重描写王葡萄如何在困难的环境中辛苦度日,如何在平凡的日子中养活公公、抚养自己的儿子、放弃自己的感情生活。一个女人努力地生活,侍奉长辈,在很平常的生活背后,透视出来的却是历史变动中残酷的社会现实,像孙怀清一样被打成右派的人,都饱受着煎熬。

这些很不起眼的,甚至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小人物,无论是生活在他乡的移民者,还是曾经在国内遭受过巨大打击的历史受难者,他们可以说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底层人物。病残者、假婚者、妓女、同性恋者都是人物边缘化的代表,正如严歌苓自己所说的,她对个性化的东西比较情有独钟,所以对边缘人、对边缘题材更感兴趣。

二、异质文化中的人性刻画

文学作品对人性挖掘得是否深入,可以说是作品是否达到高质量的重要标准。因此严歌苓努力让自己的作品实现超越,不只是描写情节,讲述故事的阶段,还窥探到人性的深处,最让人振奋的地方,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人物的肉体,甚至包括他们的灵魂所经历的磨难。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只是写作的场景,人物人性的复杂多变才是作家真正想呈现的。所以,对人物形象内心复杂多变的展现,深入人性深处,剖析人物的内心变化,用来揭示人性的本质所在,就成为严歌苓文学创作的一个独特的方面。

1. 文化差异中的心灵本真

严歌苓对人性的描述总是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通过对环境的巨大反差来衬托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描写在《扶桑》中体现得尤为突出。首先扶桑这个名字就取得极为有深意,它是我国南方的一种植物名称,花期长,几乎终年不绝,花大色艳,是一种美丽的植物,这就象征着书中所描写的女性和扶桑这种植物一样,应该有着绚烂的年华,如果她们在自己的家乡应该可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有一个不错的归宿,但是她们却被拐卖到了美国,被

迫成为妓女,被卖来卖去,整齐的牙齿、乌长的头发都成为提高价钱的砝码。扶桑失去了正常人应该有的生活,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反抗和挣扎,她在船上是唯一一个没有反抗好好吃饭的人,从克里斯的角度“他以为该有挣扎,该有痛苦的痕迹。而他看到的却是和谐”^[46]。扶桑的忍耐和爱使她保持了她自己独有的纯真和淳朴,哪怕是在被摧残被蹂躏的过程中,让读者在想象中再现了一个血肉丰满的生命。作者不断强调扶桑眼神中的漠然——“痴,脸上无半点担忧和惊恐,那么真心地微笑。是自己跟自己微笑。一对大黑眼睛如同瞎子一样透着超脱和公正”^[47]。实际上,作者通过对邪恶环境淋漓尽致的描写,反衬出扶桑美好的人性,来反抗这种人间的不公,扶桑高高在上看着这些肮脏邪恶的力量使用比他们灵魂更加肮脏的手段,即使被迫害被摧残,也玷污不了她的心灵,即使处于罪恶的泥淖,仍能保持本真。

男人们拖着长辫,女人们穿着绣花鞋的三寸金莲,都和美国的社会环境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的两边是两种文化的差异,如同严歌苓在《扶桑》序言中所说的“任何人、任何事件放进这个环境中决不可能仅仅是故事本身。由于差异,由于对差异的意识,我们最早踏上这块领土的先辈们不可能不会产生一种奇特的自我知觉;别人没有辫子,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辫子始终有着最敏锐、极其脆弱的感知。美国人以辫子作为凌辱、侮辱方式时,他们感到的疼痛是超乎肉体的。再有,美国警察在逮捕中国人后总以革去辫子来给予精神上的惩罚”^[48]。由此可见文化的差异,是人的神经中极其敏感的一根,作者紧紧地抓住这根敏感的神经,对人物的心灵进行了最透彻的描写,既有夸大和变形的反映,又不失本色的真性情。像扶桑一样最后虽然和刑场上的大勇结了婚,但是内心像扶桑花一般美好的纯真始终没有泯灭。

《少女小渔》又是一部再现这种传统本性的作品,尽管在那个金钱至上的美国社会,在一个心已经在追求钱财的过程中变得疯狂的男朋友身边,小渔还是毫无保留地体现出了人的良知、善良和爱心。作者从坎坷的人生和无情的现实生活中发掘出人性的自然美,小说中的小渔以自己的爱心、善心和同情心对待周围一切的追名逐利,以她注重的道德标准来对抗西方社会所看重的理性和法律,表现出作者对在这种一切朝钱看的社会中,对人性的良知和善良本质的呼唤。

2. 生活重压下的心灵扭曲和变异

人性中有积极向上的一面,就必然会有消极堕落的一面,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就要对这两方面进行详细的展现。中篇小说《谁家有女初长成》中,作者为读者展现出贫穷对一个女孩命运产生的改变,深入主人公潘巧巧的内心世界,对其心理活动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潘巧巧在进城淘金的诱惑下,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她不知道自己从离开农村的那一天开始,就步入了一个预先布下的陷阱。一方面她是比较朴实单纯的,另一方面想要赚钱过上好日子的欲望,都是她越陷越深的原因。被卖到养路工大宏家,从反抗到认命,最后成了杀害大宏兄弟俩的凶手,是抗争、报复,是人性的扭曲变异,都是潘巧巧人性被异化到了极致的表现。然而她逃到偏僻的兵站时,作为女性的干练、勤劳、温柔又都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小说通过多个层面呈现出人物心理的复杂性、多面性,让读者看到了人性的变化,从细微变化处作者将人物的心灵挖掘到了极致。

相比《谁家有女初长成》,《天浴》把对人性的扭曲和变异的刻画推向极致。文秀本身是极为爱惜自己的身体,极为清纯的少女,但是为了回成都,她不惜牺牲一切,一次次屈辱地践踏自己的身体。“老金夜里听见一个才走,下一个就跟着进来。清早,文秀差不多只剩一口气了。她一夜没睡,弄不清一个接一个摸黑进来的男人是谁”^[49]。文秀的目的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就为了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她采取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正在变得丑陋的心灵,作者用这种心灵的扭曲和变异来表现对社会生活的反思。

三、形象塑造中的文化认同与反思

1. 传统女性形象与文化认同

严歌苓在上海出生,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12岁的时候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些经历都不是在国外十几年就能泯灭的,作为一个出生、成长于中国本土的移民作家,她有着与国内作家相同的生活经历与生活体验,一个人的生活环境是她取材的土壤,这都导致她无法搁置中国这一创作的源泉。

即使严歌苓生活在美国,但是她对中国文化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强烈的情感的,她不仅将中国文化赋予传统女性的优秀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出了中国传统特有的文化特质,并且恰好地和女

性形象结合起来。她内心对东方充满渴望。她描写的女性大都具备东方女性的外貌,如《无出路的咖啡馆》中的“我”有着典型的东方人外貌,很漂亮,“像大多数亚洲女学生一样,留着最省钱的发式——披肩长发”^{[5]162}。《冤家》中南丝如她所愿的在女儿身上重版了她的青春:“看着女儿从校门走出来,连走路的姿态也是南丝自己的,一种没劲的、腻了的样儿,胯部松垮,胸部轻微向后躲闪,以使脖子与后背形成那根东方曲线——来自壁画或水墨画的那根略带消极、哀婉的淑女线条。”^{[5]164}

作者笔下的女主人公又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特有的美好品质,即使是在艰辛的生活中,她们的心灵都闪烁着中国传统的美好光辉。如《少女小渔》中小渔心地善良,温柔贤惠,对意大利老人的友好和帮助;《栗色头发》中的“我”用沉默拒绝画廊老板提出的做裸体模特并提高待遇的过分要求。这些人无论有没有受过教育,都没有向生活的窘迫屈服,都没有向美国优越的物质生活投降,都没有失去自己本应该有的本色。

《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7岁就被孙怀清买回家给自己的儿子定下了亲;《养媳妇》中的童养媳。《扶桑》中扶桑的小脚着实地让作者描写了一番:“克里斯的眼睛马上跟到那两只若有若无的脚上。一切关于这只脚的谣传都在他眼前证实了。真的有如此残颓而俏丽的东西!……这哪里是人类的足?克里斯想。他走进它们。这是一种在退化和进化之间的肢体。这是种似是而非的肢体”^{[6]11}。童养媳和裹小脚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下畸形的产物,它们伴随了中国女性很长的一段时间,长得都无法想象。严歌苓并没有逃避这些传统中的糟粕,而是加以利用,塑造出了像王葡萄和扶桑这样传统的女性形象。

悠悠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作者根据自己独特的见解,将它沉淀在每一个女性形象的灵魂品质上,尽管身处糟糕的环境,身边有着无法估量的困难,没有可以依靠的臂膀,她们都以博大的胸怀去包容,她们都拥有自己的梦想,拼命奋斗着,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我们不难从这些女性形象上看出作者自己的人生态度,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是值得我们去维护和坚守的。例如《风筝歌》中的英英在颠覆父亲的传统教育后,投向西方社会,然而最后却被抛弃了,弥留之际她选择了回归,“那些用布条子做成的卷发完全直了,于是,她中国父亲的一半在她的身上渐渐浮现,不断扩张,最终完成对她的神韵气质的占领”^{[7]267}。

2. 移民形象中的文化反思

移民形象是严歌苓小说中比较重要的成分,要刻画好这些形象就避免不了描写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也许正是因为作者自己也是一个移民者,有着海外求学、生活的亲身经历,才能把移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真实地写到作品中去。描写他们如何打工挣钱,如何和周围的人相处,甚至是如何受到歧视等等。例如《花儿与少年》中年轻的晚江是怎样受到自己丈夫寸步不离的监视,九华独自居住在唐人街,靠打工养活自己。《女房东》中的老柴在一家中餐馆里打工,并且描写他是如何和女房东相处。《冤家》中南丝去退一条裙子时说“我们一个月买菜钱也不到两百五十八,给车加油也够十几次了”^{[5]164}。但是她却为不用矫正牙齿的女儿戴牙齿矫正器,认为矫正器戴在孩子嘴里,等于是妇人们的首饰。严歌苓笔下的移民生活基本都是如此真实和朴实的,没有太多的奢侈,没有繁华的超市、典雅的酒店、舒适豪华的生活,这正好与她所塑造的底层边缘人的主题相契合。

英国哲学家赫德认为:“语言不仅仅作为交流中介,而且是民族性不可侵害的神圣本质。”^{[8]63}语言,是改变环境首先要注意到的问题,出国留学、定居首先要掌握移民国家的语言,如果你不会,那么你拿什么和别人交流呢?不和别人交流,久而久之,你就注定是被大家排斥的对象。所以语言是所有移民者最先遇到的一个障碍,在异国生活就要学习人家的语言,这一点在严歌苓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例如《花儿与少年》中的九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句英语也不和别人说,上课也不回答问题,就连继父强迫他说,一点一点教他,他也是闷不吭声,就这样“半年后,人们开始无视九华。他成了这房子里很好使唤的一个隐形的小工……九华早早到学校,其实就在课堂里又聋又哑又瞎地坐上六七个小时。……女老师说九华是个不错的孩子:不吸毒、不打架、不跟女同学开脏玩笑。九华只有一点不好:上课不发言,邀请他或者逼迫他,统统徒劳:他宁可当众给晾在那儿,站一堂课,也绝不开口”^{[5]164}。徐晚江说了一句很真实的话“你看妈三十八岁了,还在每天背新单词”^{[5]167}。徐晚江每天把单词抄记在小黑板上,每天背诵。语言不行就注定会造成很多麻烦,产生很多矛盾与冲突,例如《冤家》中的南丝要去退衣服遇到的麻烦,“当时我哪儿懂她说什么!你就跟她说我妈不懂英文,跟她说 sorry,我妈什么也不懂”^{[5]165}。

外来移民要想融入异国环境,不论他们有多么努力,其实也只能是在行为上、生活上,甚至是文化上越来越本土化而已,在他们骨子里还是会受到故乡传统文化的支配,从而产生很多的矛盾,即使语言不是困难了,在其他的

一些方面,还是有着很多深层的冲突。《花儿与少年》中的仁仁,4岁的时候就和母亲去了美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对她来说已经不是困难了,但还是经常在行为上不断被继父瀚夫瑞纠正:

“仁仁,忘了什么了?”瀚夫瑞说。

仁仁马上咕啾一声“对不起”,然后说:“把那个递给我。”

“说‘请把它递给我’。”

仁仁说:“我说‘请’了呀。”

“你没有说。”^⑤……

按道理说仁仁正按照瀚夫瑞的理想长成一一位上流淑女,但还是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等着瀚夫瑞纠正,就更不要说像九华这样年纪已经不小了才移民去异国的,不融于移民国家的地方就会更多,而且改变起来也会更困难。由此可见,外来移民在方方面面都有着不融于异国他乡的地方,而这些差异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正是他们面临的现实和困难。因此,作家把这些现实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将笔锋触及到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尴尬情境中,“紧紧围绕异域生活中最敏感的、也是最具文化冲突尖锐性的身份及情感认同问题,揭示出处于弱势文化地位上的海外华人,在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时所感受到的错综复杂的情感”^{⑥357},不能说这里面没有作者最初到美国的经历,把自己的经历和真实的感情融入所创作的人物中,更加体现出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下,矛盾和冲突的难以避免。

作为一个移民作家,严歌苓描绘了一批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底层形象,在他们身上我们固然可以看到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严歌苓的作品呈现出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展示了海外华人不同的生存策略,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全球化的当下,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应当如何共同生存的途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客观冷静审视中国文化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吴中杰. 文艺学导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2]严歌苓. 严歌苓文集[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 [3]倪立秋. 新移民小说研究[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 [4]严歌苓. 扶桑[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 [5]严歌苓. 严歌苓自选集[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 [6]严歌苓. 无出路的咖啡馆[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 [7]严歌苓. 白蛇[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
- [8]王晓璐. 种族/族性[J]. 外国文学,2002(6):62-66.
- [9]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2版.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The Compatibility and Contrariety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Take the Grassroots Image by Yan Geling for an Example to Examine Her Literary Creation

Duan N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The image of the grassroots in Yan Geling's work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one is the immigrants who live in the bottom of the society, the other is the witnesses of the special historical society and tide of culture in home. Both of them are poor people. The author unfolded the embarrass life of those people and the twisty or genuine of humanity by describing their living condition and mental state. All of those indicated that the author are affected by the dual influ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 and overseas immigrant, and meanwhile trying to make a deep analysis of the contradicted identity and emotion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Key words: Yan Geling; grassroots image; mental description;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cultural difference; self-identification